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当代视野

郭建宁 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丛书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当代视野

郭建宁 著

毛泽东

策划编辑:刘玉强

责任编辑:柏裕江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郭建宁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ISBN 978-7-01-007715-4

I. 马… II. 郭…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6685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

MAKESIZHUYI ZHAXUE ZHONGGUOHUA DE DANGDAI SHIYE

郭建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206 千字 印张:13.5

ISBN 978-7-01-007715-4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顾问 李 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

沧 南 湘潭大学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杨瑞森 教育部社科司原司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主 编 彭国甫 李佑新

副主编 王向清 颜佳华 唐正芒 夏佑新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向清 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许全兴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部长,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李佑新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唐正芒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中心、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所所长、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唐凯麟 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夏佑新 研究员,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副馆长

梁 柱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彭国甫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党委书记,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颜佳华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毛泽东思想与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丛书策划 刘玉强博士,《新华月报》编委

目 录

导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途径和特点	(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7)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途径	(16)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1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20)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2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理解	(28)
三、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宣传	(32)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36)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	(3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意蕴	(59)
三、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	(63)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思考	(73)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73)
二、防止辩证法的简化和绝对化	(77)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双重影响	(88)
四、关于传统文化继承方法的探讨	(9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101)
一、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	(101)
二、文化热与国学热	(117)
三、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121)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31)
一、《论十大关系》的当代价值	(131)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当代解读	(134)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当代思考	(144)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的发展	(152)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	(152)
二、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	(158)
三、建设和谐文化	(167)
附录一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进展	(175)
一、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成果、新亮点	(175)
二、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新思考	(181)
三、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途径、新领域	(186)
四、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方法、新走向	(188)
附录二 民族精神与人的发展	(192)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192)
二、人的发展的科学内涵	(199)
三、中华民族精神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201)
四、需要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	(206)
后 记	(209)

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无论是论著、论文,还是研讨会、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都是主题词之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如何能在现有的基础有较大进展与突破,问题意识的明确与方法论的自觉尤为重要。我觉得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目前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研究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有两种书名:一是“在中国”,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等;二是“中国化”,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但是,有相当多的冠以“中国化”之名的书实际上讲的就是“在中国”,“中国化”不过是一个颇具理论色彩又很时髦的名字而已。一些题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与论著,完全可以叫做“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有联系,但是绝不等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像西方哲学在中国,不等于西方哲学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传播与介绍即可。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此之外,还要有加工制作、综合创新、实践运用等等,这要困难得多。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38 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原本的提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4 年此讲话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时还是沿用这一提法,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公开出版时才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至于修改的原因则主要是顾及苏联人的情绪)。可是一些研究者由于对这

一文本依据和历史情况不了解,其相关论述就会显得似是而非。比如有的论者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体化就包含中国化的意思,中国化已呼之欲出了。有的论者则针锋相对,指出具体的化虽然有一些中国化的意思,但毕竟不等于中国化。看似争得热闹,却是个伪问题,原因就在于文本把握的缺失。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一些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者身上,看来,不了解、不熟悉文本依据,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着重强调的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密不可分的,离开实践这个主渠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具有时代性,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具有民族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相结合,使之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民族性,就是实践特性、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三位一体、有机结合与完整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时代化和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毫无疑问是主题和基础。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在讲民族性时要把握时代特点,在讲时代性时要体现民族特色,使之在实践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总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时代化和民族化。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开拓创新,体现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虽然从命题的提出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后(毛泽东)。但是从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看,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滞后。我们可以说已经建构了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新形态,却很难说已经建构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密切联系的,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李达、毛泽东等的有关著述,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如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难以截然分开。但是两者又不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部分和更深层次。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或别的什么中国化,而只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几千年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要的和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5. 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思想层面的中国化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化

首先,就中国化的指导思想层面而言,由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政治化的特点,有时候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难以完全分清。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思想层面的中国化,但是其中不少方面也具有学术层面的意义,尤其是当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时就更是如此,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政治性学术”。其次,就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而言,比较起指导思想层面,显得成果不多,比较滞后。就是说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不匹配、不协调的。总得看,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破性的进展不多,大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当前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也就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这方面的任务相当艰巨,我们应当为此而继续努力。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有论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带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后者是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这个“两化”的解说是有启发性的,但是应当注意的

是在实践中“两化”往往成了“一化”，即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经验也“中国化”。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都很高，常常并用、互用和混用。两者的区分何在？理论界通常的解释是，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结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这一界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过程与过程，过程与结果是相互联系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同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可以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也可以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总之，应当辩证地理解和把握。不久前有学者发表文章，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认为，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并且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运用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上所述，这种见解只看到了指导思想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不仅要体现在指导思想层面，还要体现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与文化重建、哲学转型与哲学建构等方面。应当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没有结束。特别是文化转型与哲学建构的任务还很繁重，有的还在起步阶段甚至尚未破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结束，而是仍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结束，而是还有许多工作要花大力气去做。

8.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社会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同时马克思主义改造与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要注意中国的具体情况，顾及中国的特殊国情，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或者说得更清楚，是中國人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习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情况，前者可称作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后者可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结合，就是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这样的“化”是一

把“双刃剑”，搞得不好，可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反之，则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某些病变、挫折和失败。

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由于实践维度已经谈得很多了，因此这里主要探讨一下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性的同时，当前还应当大大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文化条件、文化基础、文化维度、文化意蕴、文化解读、文化反思的研究。

1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已经存在的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则处于建构之中，是未完成的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这些年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比如，强调这一形态的真精神（文本研究）、当代性（对话研究）、中国化（本土研究）、创新性（综合研究）等等。但是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表述比较含混，不好把握。比如有学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或当代形态，其内涵和内容并不清楚，看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和当代形态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上述关于新形态的争议与分歧，说到底还是究竟怎样理解中国化的“化”的问题。在我

看来,理解、阐释、运用、发挥,不能说与“化”无关,但却不是“化”本身。所谓“化”,就是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变化、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实现中国的文化转型、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最关键和最基础的就是要指导和影响中国的社会变革,这个目标虽然说大体已经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并没有结束。而更为重要和困难的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生活规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概而言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中国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即既是中国本土的,又是中国大众的。说它是本土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融为一体,说它是大众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哲学。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体现和最终成果,任重道远,我们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途径和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鲜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结合、融合、磨合、整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观念形态转为实践形态的过程。认真回顾、总结、梳理、反思 20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验教训、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向,对于推动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这一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以往的研究在社会条件、阶级基础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论述,这里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中西文化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激进主义的文化观,梁漱溟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和胡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态势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和格局,再进一步的提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确立,并逐渐成为主导呢?从文化根源上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两难选择的产物

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都陷入了一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架构之中,即对西方文化是要肯定的,在现代化方面他是先生,但是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作为侵略者,又要否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和近代中国的节节败退,屡战屡败,不适应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否定的,但是否定中又有民族性、民族感、民族精神的问题,因此又要肯定。要肯定的又要否定,要否定的又要肯定,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认识的矛盾和复杂背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文化认识的许多命题和悖论,都与这个背景有关。王国维就说过“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问题,前者指的是中国文化,后者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学者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既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遗产又可以被称为吃人的礼教;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既可以是文明的导师又可以是强权、霸权和侵略者。一方面,要享用西方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杜绝西方社会的罪恶,由此产生的可能的结果和合适的出路,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唐君毅语)。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它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反西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正适合了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理。

(2) 两次危机的结果

所谓两次危机,一是儒学的危机,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使儒学先后退出教育和政治领域。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儒学在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危机。二是西方文化的危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少生灵涂炭,战后的欧洲一片萧条。1918年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稍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也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并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更为严峻的是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竟然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本质,激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强权战胜公理,这既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救亡压倒启蒙,又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去信心,使西

方路向幻灭。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不难理解了。

(3) 双重挑战的解答

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着学习西方与救亡图存,实现富强与复兴传统的双重任务和双重挑战。一方面,中国要跟上时代,学习西方的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同时又要抵御西方的霸权。这里的现代性和霸权都来自同一个对象——西方和西方文化,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这对于中国的文化选择来说,正是尖锐冲突的。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富强,要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又影响传统。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面临困难,既要“迎合西方的现代化而改革传统,又要抵抗西方殖民霸权而复兴民族”^①。而这两者也是冲突的,迎合现代性就会削弱抵抗西方的殖民霸权,改革传统又会使复兴民族受到影响。面对如此的复杂局面,如上所述,中国人只能选择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

(4) 选择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

1919年7月25日,巴黎和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来华,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列宁领导的新兴苏维埃共和国,成为20世纪新“公理”、新文明的象征。于是,五四知识分子由亲西方转向亲苏俄,对西方的幻想破灭,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现代性选择的转折点。

(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以上几点固然重要,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更为关键。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诸如:都对客观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张‘入世’而非‘出世’(从这点来讲,儒家思想距离马克思主义要比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距离马克思主义更近一些。这也是同样是一穷二白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先在中国传播、开

^①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花,而没有在印度扎根的原因之一);都重视社会现实问题,讲究实际和实践,尽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改造社会的手段和目的相去甚远,但都立足于从解决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过去和来世;都依赖人间的实有力量,而不是借助超人间的力量,即上帝鬼神的力量;都强调群体利益,提倡利他精神;都以理想世界为现实行动的鼓舞力量,如传统的‘大同’、‘平均’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①另外,“《周易》的阴阳二元论和矛盾辩证法之间,‘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逼上梁山’与阶级压迫导致阶级反抗等等之间的某些联系,自然成为‘结合’的内在契机。”^②总之,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文化基础。

(二)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理论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严复翻译介绍,达尔文进化论风靡全国。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如梁启超云:“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但有形学科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近四十年来之天下,进化论之天下也。”^③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此之前,还可以说一句,严复翻译《天演论》,送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上一个世纪之交,严复为介绍西学的第一人。他翻译出版《天演论》,宣传介绍进化论,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次地震,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效果,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迷恋与崇拜进化论。在当时国力衰微、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严复所宣传的进化论无疑给国人敲响了警

①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③ 《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